

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旨趣与影响

——来自留美生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的考察

元 青

摘 要:民国时期,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的中国问题研究,涉及中国移民与文化适应及华人社区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宗族家族问题、民族问题及人口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社会控制问题、慈善事业问题、劳工问题、犯罪问题、鸦片问题、美国对华舆论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广泛选题范畴和丰富内容,彰显了求实致用的强烈现实观照、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旨归的本土化研究旨趣。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反响,构成西方现代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国内学术界影响至深,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之门,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学术运动的滥觞。

关键词: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学;人类学

民国时期,一大批中国海外学子热衷中国问题研究,充分体现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学子学为己用、使西学为中国服务的研究特点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其中以研习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批留美学子尤甚,他们撰写了一批致力于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并代表其学术生涯研究方向和较高研究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更加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开启了其后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探讨,既可弥补既往近代留学史研究中留学生海外求学期间学术研究状况语焉不详之缺陷,也可从学术史上重新发现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求实致用、重中国问题研究的优良传统,并为思考与接续这份历史遗产提供镜鉴。

—

民国时期留美生写作的30余篇中国社会问题博士论文,其彰显的最鲜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就是求实致用的强烈现实观照、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旨归的本土化研究倾向。其以中国社会

现实为题材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内容和以学术为中国服务的选题缘起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群体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移民与文化适应及华人社区问题。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叶崇高的《中国毕业生在美国大学的适应问题》、陈文仙的《移民法与排外法下的中国人》、张乡兰的《芝加哥唐人街的中国儿童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及其教育影响》、陈怡萱的《纽约的中国社区,1920—1940:文化适应研究》、陆琪臣的《费城的华裔美国人》、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研究》、谭金美的《落基山地区华人社区兴衰》等都属于论述此类问题的论文。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破产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到海外谋生;与此同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殖民地的开发还是本国的发展,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催生了数量巨大的“契约华工”;加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致的大量战争苦力、逃难者及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国外迁徙,到民国后期,中国的海外移民达到历史高峰。其中,美国是中

收稿日期:2015-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63)。

作者简介:元青,南开大学(天津 300353)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移民的最大侨居国之一。华侨华人对美国等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与侨居国民众之间的经济冲突与文化种族冲突。华侨华人在海外如何自处与发展,文化种族冲突如何有效消解,成为摆在中国移民与侨居国、中国政府面前一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群体身居美国,耳濡目染,本身又是“桃花源中人”,对此显然有着高度认知与共识。在从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 20 多年时间里,先后有 9 人选择了移民及其文化适应、华人社区研究课题,占到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的 1/4 强,数量相当惊人。

中国乡村建设问题是留美生关注的又一重点。李汉铎的《从美国乡村教堂到中国乡村教堂的管理调整》、陈希诚的《中国乡村合作的伦理和经济基础》、杨昌栋的《平潭调查》、杨懋春的《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谢景升的《中国乡村重建:问题与办法研究以及对中国政府与基督教堂的政策建言》等都论述了此类问题。

民国时期,由西方列强侵略带来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军阀混战政治失序及连年自然灾害等所致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土地高度集中,无地或少地农民激增;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大大降低,购买力与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民绝对贫困化,许许多多贫困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暴动与抗争此起彼伏。全国农村经济与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村的衰败与动荡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他们以各种方式掀起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倡导合作、兴办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国内的乡村危机及以解决危机、“民族自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样引起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群体的关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少有 5 篇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以中国乡村建设为主题,涉及乡村宗教、乡村合作、地方乡村社会调查及改革、乡村经济与社会生活、乡村重建的问题与办法等广泛话题。其中,杨懋春的《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最具代表性,是对国内方兴未艾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紧密呼应。对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学术缘起,杨懋春在博士论文前言中开宗明义,自己之所以写作研究中国乡村

问题的题目,就是因为“当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这类研究有助于消除自运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浪费和无效,而且还能防止重大的失误”^[1](作者前言,P1)。他把自己的研究与防止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浪费、无效与失误直接挂起钩来,反映了其以学术为国家服务的良苦用心。

中国宗族家族问题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度》、冯汉骧的《中国亲属制》、郑成坤的《中国:一个转变中的宗族社会》、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嗣群及其功能》等都属于此研究范畴。其中,尤以冯汉骧的《中国亲属制》影响最大。关于中国亲属制研究的价值,冯汉骧在文章之首作了如下表述,他说:“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都建立在‘扩大家庭’组织的基础之上,而扩大家庭又建立在其内部成员系统化了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如果整个社会的结构要协调地发挥作用,那么,表述和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亲属制度必须得到调整。”^[2](导论,P1)换言之,中国是一个重人伦的国家,亲属关系及其网络盘根错节,亲属称谓纷繁复杂。要想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乃至使其协调地发挥作用,必须首先把握中国的亲属结构。冯汉骧的研究无疑有着人类学、社会学学术上的卓越建树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意义。

中国民族问题同样是留美生关注的一个领域,此类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仅有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² 篇博士论文,但皆在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别具特色,堪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在 40 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李济对自己在哈佛的中国问题研究旨趣作了如下叙述,他说:“我所感觉到的,是在做学术工作中,所谓方法论者,诚然是很要紧的项目,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一种常识的推广,绝不是与我们常识相矛盾的。……我所最感深切及有兴味的一点是: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3](P199)而林耀华之所以做研究贵州苗民的论文,也是因为其时国内“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中国社会对边政学有迫切的实际需求”,“人们对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4](P61)林耀华此文无疑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除上述几类问题外,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社会控制问题、慈善事业问题、劳工问题、犯罪问题、鸦片问题、美国对华舆论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都纳入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博士群体的选题范畴。这些选题紧密呼应了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治失序、社会问题成堆的现实状况,希冀能用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办法。其中,孙本文的《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都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对自己的研究使命,孙本文说:“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如何满足人民之需求,解除环境之侵迫,以谋妥善之调试,此则社会学者与有责焉矣。”[5](序,P1)吴文藻硕、博论文选择的都是中国题目,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身体力行。对自己海外求学期间热衷撰写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的初衷,吴文藻后来曾回忆说:“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我写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追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国民革命高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故写了这篇为国宣传的论文”,“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想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6](P80)之后,这种“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的理念延伸到其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他称自己写作《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主要缘起,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我运用历史方法的能力和析文献资料的能力”。[6](P81)

对民国时期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关注中国问题研究的缘起与旨趣,林耀华后来曾回忆说:“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4](P4)吴景超也曾在留美期间写作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学术界之所以日新月异,就是因为多数学者能逃脱书本的束缚,到实验室里,到社会上,去搜集新的材料,求取新的知识。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开掘过的丰富宝藏,若肯用推敲古书的功夫,研究中国社会的情形,成绩一定大有可观,亦定能促进中国社会改良。[7]以美国学术界为榜样,求实致用,深入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以达

改良中国社会之目的,充分反映了留美生热衷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心声。考察他们博士论文的内容及学术旨趣,应该说这些言论反映了其时一大批留美博士群体的心路历程。

二

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博士论文,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传播,一批论文成果公开问世,兹列如下。

1. 朱友渔的《中国慈善精神:一项互助的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12 年出版英文版;
2. 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度》,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 1922 年出版英文版;
3. 余天休的《中国的社会控制与进步》,北平中国社会学会 1923 年出版英文版;
4. 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23 年出版英文版;
5. 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美国科学院出版社 1928 年出版英文版;
6. 祝世康的《中国劳工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出版英文版;
7.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28 年出版英文版;
8. 许仕廉的《儒家政治哲学》,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 1932 年出版英文版;
9. 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34 年第 3 期;
10. 叶崇高的《中国毕业生在美国的适应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4 年出版英文版;
11. 杨昌栋的《平潭调查》,上海广平书局 1935 年出版英文版;
12. 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以英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37 年第 2 期;
13. 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以英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0 年第 5 期;
14. 龙程英的《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演进》,南加州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出版英文版;
15. 杨懋春的《中国集镇与乡村生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45 年以 *A Chinese Village-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为题出版英文版;英国伦敦的吉甘·保罗、特伦奇、图布纳出版公司 1947 年出版英文版;劳特利奇出版社 1948 年出

版英文版；

16. 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研究》，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 1948 年出版英文版；

17. 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嗣群及其功能》，纽约的维京基金 1948 年出版英文版。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留美生至少有半数即 17 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以英文形式出版或发表，且主要在美国及英国出版或发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界的较大关注，涌现了相当一批学术评论。

朱友渔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主修社会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留美生，他的论文《中国慈善精神：一项互助的研究》于 1912 年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经济评论》1913 年 7 月发表署名弗兰克·D. 沃森(Frank D. Watson)的文章，对朱友渔著作进行了介绍。文章说：“通过本书，‘慈善’一词被赋予更深刻和广泛的含义，因为这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努力。”^[8]书中内容主体包括慈善组织、互助组织、居民福利三部分。在“慈善组织”部分，朱友渔系统讨论了当时慈善努力的方向，即主要为老年人、寡妇、孤儿及穷人提供帮助；在“互助组织”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宗族组织、乡村社区、地方联合会、贸易与手工业行会组织；在“居民福利”部分，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慈善理论与实践及个人的慈善行为。此外，他还以一章篇幅对“思想与实践中的慈善事业”进行了总的分析，阐述了古代与近代中国作者将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美德的态度，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慈善事业，简要介绍了当时中国慈善事业的范围与特征。又用一章讲人口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陈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过载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对出生率要进行有效控制。

徐声金的《中国家庭制度》1922 年在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后，钮金特(Fr. Nugent)1923 年初在美国《天主教历史评论》发表书评，认为“这部著作对英语读者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有着四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家庭制度”^[9]。书中前三章讲述了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历史，接下来的四章讨论了现今的家庭制度，包括中国人的结婚、离婚、父母之命及中国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等。第八章讨论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并给出对这种祖先崇拜本质的解释，认为祖先崇拜并不是迷信。钮金特认为，徐声金的这种观点与事实相矛盾，他认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祖宗牌位是

逝者灵魂居住的地方的观念，烧纸钱、供奉食物及在祖先牌位前跪拜的行为，都证明存在于中国的祖先崇拜就是纯粹的迷信行为。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在英美学界引起关注。1929 年 5 月，由英国皇家人类学院主办的《人类》杂志发表了署名考拉姆(Collum V C C)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李济著作的成就，认为这部“由中国人类学家用英文写成的著作分析透彻，观点鲜明，值得热烈欢迎”^[10]。特别是他利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人体质数据所作的调查及对史上城墙建筑资料、姓氏资料等的精确和批判性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华。文章最后希望李济“这位勤勉而具有独创性的调查者能找到扩大史前时期研究的机会与方法，同时在将来的出版物中能补上先前欠缺的索引”^[10]。同年 11 月，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也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李济著作是一次“细致的人类学探索，说明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存在的”^[11]。书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类体质测量表、各种图表、地图来说明人口的迁移和中华民族的几次重要分化，说明“他们的民族志充满了跌宕起伏”^[11]。

冯汉骥的《中国亲属制》1938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后立即引发学术反响。伯纳德·W. 阿金斯基(Bernard W. Aginsky)1938 年 9 月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冯汉骥的论文“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亲属称谓的成果”，“对那些致力于研究中国家庭轨迹的人来说，将大有用处”。“论文史料丰富，内容简洁明了”。^[12]但同时也认为冯文存在较多局限，如“视中国文化为单一文化”“对婚姻与亲属制度的考察充满矛盾”“缺乏地方志资料”、运用当代理论分析问题不足等。^[12]弗莱德·埃根(Fred Eggan)1938 年末在《美国民俗杂志》载文对冯汉骥文章也进行了细致的介绍与评论。他称赞冯文“是关于中国亲属用语系统的权威研究，该研究不仅对社会组织中的学生有价值，对其他人群也是有裨益的”。“它向读者展示了关于内部组织的中国现代亲属系统，这种系统与多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它的历史发展进程。研究的方法采用的是历史的和语言的方法”。评论认为，以往西方学者利用部分史料试图重建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但大多数人的成果不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充足的史料和先进的亲属理论知识。而冯博士的研究显然超越

了西方成果,是“考察亲属称谓制度的典型”。^[13]布伦达·Z. 塞利格曼(Brenda Z. Seligman)1939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文,客观介绍了冯汉骥论文的主要内容,并称赞“对欧洲研究者来说,该研究工作价值颇高”,同时也指出“很遗憾的是文中的脚注和参考文献用的都是中文”,给西方读者带来不便。^[14]留英的费孝通1938年8月也在英国《人类》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冯汉骥论文运用的历史的、语言的方法“遵循了从摩尔根、哈特到施洛克的研究方法”,文中收录的338个亲属称谓和丰富的脚注材料,说明冯先生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文中对“从儿称”的研究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15]

郑德超的《费城华侨:一项文化接触的研究》1948年由福建协和大学印刷所出版英文版后,也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反响。许烺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鉴》刊文评论说:“作者在书中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中国人能被同化吗?他们已经全部被同化了吗?如果没有全部被同化,原因是什么?如果已经被同化,同化的程度又如何?”^[16]该书的贡献,一是“为那些想知道在美中国人生活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二是“对未来想要将费城的中国人和其它地区的移民作比较研究的人来说大有益处”。该书的不足是作者尚未能将西方理论“在书中融会贯通”。^[16]谭金美在《美国社会学评论》载文简介了郑著的内容,认为该书对在美华人的研究比以往“华裔社会学家”的研究更透彻,是研究在美中国人的重要著作。全书行文流畅,图表、数据材料独特充实,提高了书的价值。“对那些从事中美交流及少数族群文化交流研究的人来说,此书值得一读。”^[17]理查德·T. 拉皮埃尔(Richard T. Lapiere)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简要评论,认为“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关于费城唐人街的数据与材料”^[18]。

胡先晋的《中国共有的继嗣群及其功能》1948年在纽约出版后,杨懋春在《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他提出:中国的“继嗣群”是精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联合体,它以传统和法律为基础,在中国社会组织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在道德与伦理上指导个体的生活,用公产来救助贫弱,或者在财政上为个体提供教育经费。这一群体受宗教、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保护,拥有相当可观的权利。对这样一个群体及其功能进行研究,“无论

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上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9]该著中英文史料丰富,对从事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人来说,有重要的探讨价值。^[19]美国《生物学评论季刊》第24卷第1期(1949年3月)发表了欧文·H. 阿克纳施特(Erwin H. Ackernecht)的短文,对胡先晋著作进行了简要评论。^[20]

在留美生诸多公开问世的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文中,民国时期在西方影响最大、评论最多的著作是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在该书出版前后,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一股评论热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林顿(Ralph Linton)教授亲自为该书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西方学者研究异域文化面临的重大难题是,“他不仅必须对这种语言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还必须对他的研究对象有真正的同情和超乎寻常的敏锐。他必须有能力看到事情的情感领域,而且能够理解许多没有说出的东西”^[1](林顿序言,P2)。但遗憾的是,这种情感很难通过学习或教育获得。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在异域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那些人,通过他们的帮助来理解这些文化。杨懋春作为“切近参与”中西两种文化的“边缘人”,其工作无疑大大有助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杨博士对他的村庄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当地村民,又能用科学的无偏颇的态度进行研究。他的描述既准确又充满感情,社会科学家和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他的这项研究不是此类研究中最早的,但我认为是最成功的研究之一。”^[1](林顿序言,P3)美国农业部推广部主任威尔逊(Wilson M L)在为该书撰写的导言中称颂杨著“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农业社区这一新途径的成功范例”,该书“通过把乡土中国放在它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个村庄中,提供了乡土中国的生动描述”,“给了我们一把理解中国乡村文化的新的、科学的钥匙”。他认为,杨懋春著作的最大贡献,在于有助于人们理解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及“不可能把我们的文化移植到亚洲”的观点。^[1](威尔逊导言,P2-3)美国人类学家沃尔特·R. 戈德施密特(Walter R. Goldschmidt)刊文认为:“对人类学家来说,台头村将代表今后的研究方向,无可非议,它将成为在社会人类学方面研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的重要参考。”“书中描写的微观世界,可以让我们一窥广大、神秘的中国乡村生活的一角。”同时,他也认为,该书作为“亲

族民族志”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包括缺乏总结和归纳,有些地方不准确,对乡村政策的讨论令人失望等。[21]保罗·F. 克雷西(Paul F. Cressey)的书评充分肯定了杨懋春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杨懋春“没有像大多数美国社区研究者在描述某种社会组织所运用的那样,强调将社区生活分为商业、宗教、家庭、教育、娱乐、政治等各方面”,而是“以家庭为中心点,描述围绕这个中心所涉及地区的活动”。[22]他对家庭生活中母亲重要地位的分析也是非常新颖的,与西方学者强调父系家长制和父亲的权力不同。书中的不足是:对民俗、民间宗教活动、迷信活动关注较少;凭记忆写作,缺乏准确数据,不像用通过直接调查的结果写作那样具有说服力;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动因、发生的方式及变迁对村内文化造成的影响缺乏详细分析。但瑕不掩瑜,“该书显示了一位社会学家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及他对中国乡村的关怀与理解”[22]。理查德·T. 拉皮埃尔(Richard T. Lapierre)的文章认为,杨懋春的著作“是作者由人类学家向社会学家转型的重要标志”,“虽然主要是对一个具体村庄特定行为的分析,但在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广泛影响”,书中“对村民生活的描述不仅具有科学的客观性,而且不乏作者深厚的感情”。[23]在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家热烈讨论杨懋春著作的热潮中,时在美国任教的留美学人陆琪臣、留英学人许烺光也参与了评论活动。陆琪臣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鉴》第244卷(1946年3月)发表文章,认为“近来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籍已出版不少,但是本书仍能引起极大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其开拓了另一种研究中国的方法”。“作者拥有人类学家的素养,并且对他所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也极为熟悉,在进行研究之前,个人的观察和经历使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他最后评价该书“英文行文流畅,书后索引完整”,“不仅对社会学家而且对普通读者都将是一本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的著作”。[24]许烺光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1卷第6期(1946年12月)发表评论,称颂杨懋春著作是一部“使读者欲罢不能的出色著作”,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于数据的运用以及深入分析,这些数据被巧妙地整合在一起,“显示了作者在人类学上对科学方法的熟练掌握”;“该书不仅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一般读者也大有裨益”。[25]

上述评论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细致

的分析、点评,有称颂与褒奖,也有批评与商榷。尽管观点各异,但有一个看法几乎是共同的,即普遍认为,中国学人的这些成果为西方认识与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林顿教授在评价杨懋春著作时甚至认为,“任何切近地参与两种文化的人,都处于更加清晰地观察这两种文化的位置”,留美生这些“边缘人”,“不仅把他们的文化解释给我们,而且也向我们解释我们的文化”,这是“对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1](林顿序言,P3)

20年代中期以后,出于加强远东地区研究尤其是深入把握中国形势的需要,美国学术界热衷探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并使传统汉学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中国学。如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学会,其长期研究规划就涉及美国政府亟须了解的中国几乎各方面问题,如人口问题、乡村土地占有与农民问题、宗族家庭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工业化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等。留美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群体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无疑契合了美国这股政治与学术大潮的需要,构成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学术界如此看重留美生的这些中国社会问题研究成果,也就不为无因了。

三

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在引起西方学术界关注评论的同时,对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之门,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学术运动的滥觞。

回国后的留美生继续坚持求真务实的、以认识、解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宗旨的学术价值取向,积极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主张。孙本文在1931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第二次年会上指出: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就是要“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26](P18-19),第一次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随后几年里,吴文藻进一步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主张认识国情,开展社区研究,解决中国实际社会问题。在他的倡导推进下,社会学、人类学界兴起广泛深入的社区研究和文化人类学

调查运动,费孝通、李景汉、张之毅、史国衡、林耀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等大批社会学、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对民国时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费孝通曾评价说:“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地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27](P3)}他还说:“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27](P4)}同为社会学者的雷洁琼多年后也曾评价留美出身的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要使社会学中国化”,他们“都努力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使社会学中国化,不是照抄欧美的理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社会学为国家服务”。^{[28](雷洁琼序,P6)}费孝通、雷洁琼的评价,准确抓住了留美社会学、人类学者以学术研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要旨,而这与其在美留学时开展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

回国后的社会学、人类学留美学者不仅倡导中国化的学术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延续在美时的学术训练和博士论文方向,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上继续努力,取得突出成绩,成为在美时所开拓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同时成就了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求实致用、重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传统与特色。如陈达回国后在中国劳工问题、华侨问题等领域成就卓著,他的《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即是在留美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新拓展,是上述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孙本文回国后大力宣传文化社会学,在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社会心理学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特别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领域,集多年之功力,完成自己社会问题研究的代表作《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卷本,商务印书馆1942年—1943年陆续出版),对中国家

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劳工问题皆有论列,是中国第一部综论中国社会问题的宏大著述。吴景超则延续了对芝加哥学派所擅长的都市社会学的研究理路,写出《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提出实行工业化、发展都市经济以救农村的主张,成为其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代表作。林耀华继承留美时开其端绪的民族问题研究路向,继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开展少数民族社区研究,他率考察团深入大小凉山彝族自治区、康北藏区及四川嘉戎区进行考察,出版了《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杨懋春在旅美及定居台湾后,继续中国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出版了《乡村社会学》(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等多部论著,在中国乡村问题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李济、冯汉骥进一步延续了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在中国殷墟考古、史前考古及西南少数民族考古等领域成果丰硕,成为蜚声中外的中国早期考古学的领军人物。此外,严景耀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杨昌栋对宗教问题的研究,祝世康对劳工与民生问题的研究,皆是留美生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继续践行中国问题研究特色与传统的典范。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在重建与复兴的过程中,一方面汲取西方学术资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密切结合,同时积极从民国时期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汲取营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民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是一座值得发掘的富矿,它强烈的现实关怀、所探讨的中国社会问题主题、本土的经验材料、精密有效的西方学理,已构成本土化的研究体系和学理架构。因此,要重新发现、重新思考这一传统并加以继承。需要强调的是,发现与接续传统必须自源头始,而民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特色与传统的源头,就始自留学生特别是留美生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 [2] 冯汉骥. 中国亲属称谓指南[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3] 李济.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A]. 李济文集(卷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 林耀华. 林耀华学述[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5] 孙本文. 社会学原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6] 吴文藻. 吴文藻自传[A].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八辑)[Z].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 [7] 吴景超. 都市之研究[J]. 留美学生季报,1927,11(3).
- [8] Frank D Watson. Pauperism and Charit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3(2).
- [9] Fr Nugent . Review[J].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1923 (4).
- [10] Collum V C C. China; Ethnology[J]. *Man*,1929 (29).
- [11] W. L. H. Review[J]. *Pacific Affairs*,1929 (11).
- [12] Bernard W Aginsky. Review[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8 (3).
- [13] Fred Eggan. Review[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38 (10—11).
- [14] Brenda Z Seligman. Review[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9 (3).
- [15] Fei Hsiao-Tung. Review[J]. *Man*,1938 (8).
- [16] Francis L-K Hsu. Review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50 (5).
- [17] Rose Hum Lee. Review[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0 (2).
- [18] Richard T Lapiere. Review[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0 (3).
- [19] Yang C K. Review[J]. *Pacific Affairs*,1949 (4).
- [20] Erwin H Ackernecht. Review[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49(1).
- [21] Walter R Goldschmidt. Review[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6(4).
- [22] Paul F Cressey. Review[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6 (3).
- [23] Richard T Lapiere. Review[J]. *Pacific Affairs*,1946 (2).
- [24] Homer C Loh. Review[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6 (224).
- [25] Francis L-K Hsu. Review[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6 (6).
- [26] 孙本文. 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A]. 中国社会学会. 中国人口问题[C]. 上海:世界书局,1932.
- [27] 费孝通. 开风气 育人才[A]. 潘乃谷,马戎.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28] 吴景超. 唐人街:共生与同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Chinese Social Problems Study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Based on the Stud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YUAN Qing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group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 who got their doctorates on sociology or anthropology devoted themselves to studying China problems which contained both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rich contents involving Chinese migrations and their cultural adjustment, Chinese communities, rural construction, clan and family system, ethnical and population issues, social thought, social mov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problems, Chinese philanthropy, labor problems, crime issues, opium ques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s on China,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and so on. All of these studies reflect their strong realities-care and indigenous study inclication on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their learning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 Their achievements were widespread among western scholars and received highly praise, which had been an organic part of modern sinology scholarship in the West. Besides, they also had a lasting effect o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or they led the fashion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their studies were the origin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students studying in America; Chinese social problems; sociology; anthropology